

常熟言子祠新入藏明代残碑考

孔令通



冯敏勛墓碑

常熟山清水秀、人文荟萃，名胜古迹众多，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1949年后，经考古发掘和社会征集，发现了诸多重要墓志，分别收藏于常熟博物馆、常熟市石刻博物馆等处。《新中国出土墓志》这一大型石刻文献，多为按省分卷，但特地编《江苏常熟卷》，所收上起唐代，下迄民国，共计三百二十三件墓志，是唯一一家以县级行政单位命名的分卷，足见学界和出版界的重视。

近年来，常熟市文化部门又陆续新发现石刻多种，藏于言子祠西厢。其中一方墓碑裂为两半，上半段已经亡失，仅存下半段，碑底刻有莲花纹饰。残碑长65厘米，宽38.5厘米，厚13厘米。志文7行，每行残存10字不等。正书，周边为单线框，石质。兹录文如下，并略做考证。

……原籍浙江平湖县，嘉靖十/……中闰十二月初五日午时/……庆潜山之县丞宅。次年丁/……月二十三日午时卒于苏/……之知县宅。呜呼，倏而生，忽/……死他乡。哀哉殇子/……成岁七月望日，父祐山志。

通览碑文，这方残碑当系明代嘉靖年间一位父亲为殇子所立墓碑。墓碑虽然已经残缺，但幸存部分，还是提供了关于这对父子的关键信息数条：

第一，殇子系“嘉靖十……中闰十二月初五日午时……庆潜山之县丞宅。次年丁……月二十三日午时卒于苏……之知县宅”，可知其生于明嘉靖十年到十九年之间，生年为嘉靖口申年，次年嘉靖丁口年卒。按：嘉靖十年为辛卯年，嘉靖十九年为庚子年，这十年间，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嘉靖丙申年、丁酉相连的两年。故而可知这位殇子生于嘉靖十五年（丙申，1536年），卒于嘉靖十六年（丁酉，1537年）。

第二，殇子原籍浙江平湖县，生时（嘉靖十五年）其父任直隶省安庆府潜山县县丞，次年丁酉（嘉靖十六年）去世时其父任直隶省苏州府常熟县知县。且父自署“祐山”。故可知其父为浙江平湖湖人冯汝弼（字惟良，号祐山）。冯汝弼《重修常熟县志序》云：“嘉靖丁酉，汝弼自潜山丞移宰常熟。”《祐山杂说》“达人知命”条亦云：“嘉靖戊戌，余转令苏之常熟三年”，“宋御史”条云“嘉靖丙申，余谪官潜山丞”。与墓碑所叙，若合符节。

第三，此墓碑撰于“口戌岁七月望日”，殇子既卒于嘉靖十六年（丁酉），那么这方墓碑当作于冯汝弼任常熟知县期间，故“口戌岁”即嘉靖十七年（戊戌，1538年）七月望日。冯汝弼在其妻子屠孺人故去后，撰有《亡妻屠孺人行实》（《祐山先生文集》卷6），提到屠氏生有三子：长子敏功。仲子敏勋，嘉靖十三年（甲午，1534年）生，嘉靖三十三年（甲寅，1554年）五月二十五日去世，冯汝弼撰有《仲儿敏勋妇钱氏合葬墓志铭》（《祐山先生文集》卷6）。季子敏效，嘉靖十七年（1538年）生，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去世。可知殇子为敏勋之弟，敏效之兄，当亦为屠氏所出。冯汝弼撰写妻子行实时，因此子早夭，故未叙及。

综上，这方墓碑系明嘉靖十七年七月望日，时任常熟知县冯汝弼为殇子所立，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位父亲的爱意与沉痛。这篇墓碑不载于《祐山先生文集》，系集外佚文，是目前发现的冯汝弼在常熟任上的唯一一方石刻，具有相当价值。

冯汝弼，字惟良，号祐山。以《书经》中嘉靖辛卯举人，壬辰会魁。由行人给事工科，劾罢权铨汪鋐，迁潜山丞，历常熟，余干知县，封文林郎，升太仓知州，终扬州府同知。以子敏功贵，累封中宪大夫、山东按察司副使，加赠中大夫、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。所至祀名宦，平湖祀乡贤。生弘治己未，卒年七十有九。妻屠氏，太保康禧公侄女，封孺人，累赠淑人，继徐氏，封宜人，累赠淑人。屠淑人合葬王谷山臬庄中穴，徐淑人葬墓之外昭则，周氏葬山后金丝浜。子四，俱元配出。（见《大易冯氏谱》，又可参家谱《皋八祐山公》）其生平详见王锡爵撰《祐山冯公行状》（《王文肃集》卷11，明万历刻本）。著作有《祐山先生文集》十卷（明刻本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影印本、《明别集丛刊》影印本等）、《祐山杂说》（明《宝颜堂秘笈》本、《说郛》本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排印本等）等，辑刻《三苏文辑》五卷等。其门下最有名者为太仓王世贞，《祐山先生文集》即由王世贞撰序。

冯汝弼在常熟任上，兴利除弊，造福一方百姓。据《重修常昭合志》卷20《人物志》载：“时方奉旨丈田，当事互相观望，汝弼毅然移会邻治，照乡、都、里、甲，挨圩立号，令田主同圩长自为丈量，填注号段步亩，鳞次绘图造册，戒日复核。每圩立一大旗，每段立一小旗，履亩抽复，按图而有误者重惩，而再三申复之，必合乃已。田无漏籍，户无虚粮，期年而事竣，积弊一清。汝弼为政有风裁，而宾礼贤士，聘举人邓献脩邑志。其文田著《清理田粮或问》以折当时之异议者，然同列皆忌之，竟为直指论，调去。”

冯汝弼所出之平湖冯氏，系嘉兴望族，世居平湖大易乡。近代著名学者潘光旦《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》中即对冯汝弼这一支有所论述。平湖冯氏元以上世系，家谱无存，遑无可考。自始祖冯显五于洪武年间定居平湖起，诗书传家，代有闻人。冯汝弼之父冯俊于明弘治年间辑修家谱，分抄两份，传之子孙，后因兵乱等原因焚毁无存。冯汝弼于嘉靖年间续修此谱，但今已不存。其裔孙冯秉良继承先志，纂有《大易冯氏谱》，于清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刊刻，是关于平湖冯氏家族研究的重要文献。《大易冯氏谱》对世系梳理极为详细，冯汝弼四子，包括葬于常熟的殇子，家谱中均有详细记载，其云：“敏勋，生嘉靖丙申，随任常熟县，夭，葬虞山麓慧日寺。”据此可知冯汝弼葬于常熟的殇子名冯敏勋。家谱中记载了冯敏勋生年及去世地点，与冯汝弼所撰墓碑——吻合。故言子祠这方明代残碑碑主为冯敏勋，此碑可称为冯敏勋墓碑。特别是注明冯敏勋葬于虞山麓慧日寺。《（嘉靖）常熟县志》卷10《寺观》：“慧日寺，在县治稍西。梁天监中僧惠向建。宋大中祥符元年敕为禅院，绍兴十五年毁于火，乾道淳熙嘉定始复旧观。元元统元年僧普明建观音殿于东偏，殿前有钟阁二级，悬宋邑令张观复所造铜钟，官设夫司钟以警旦暮。国朝宣德九年阁坏，邑人张士良重构。今为祝圣道场，归并寺二庵三。”据《（乾隆）苏州府志》卷25《寺观》载：“慧日禅寺，在县治北九十步。”可知冯汝弼选择将其子葬于此地，离县衙相距九十步，别有深意。慧日寺在清代旋兴旋毁，始终为邑中首刹。抗战期间，遭到日寇毁坏。1952年，慧日寺拆建为工人文化宫。《俞鸿筹日记》该年9月30日载：“吾邑慧日寺，创建于梁天监年间，屡毁屡兴，因所处在市廛之中，寺地日窄，前之松桧竹石悉无有矣。其中结构颇多明代遗物，顷闻已全部拆去，邑中古迹又少一处矣。”20世纪80年代，曾在慧日寺旧址征集到宋代经幢残件等碑刻。这方冯敏勋残碑当也是出土于这一区域。冯敏勋墓碑立于明嘉靖十七年（1538年），迄今近五百年，当是墓碑立后若干年即仆倒埋于地，故而近年出土时残缺了上半部分。因为埋于地下，少经风吹日晒，因此残碑碑面平整无划痕，字划十分清晰。



图3 说法图

嘉兴真如塔藏血摹本《金刚经》浅析

时西奇 豆丽丽



图1 盒盖正反面

图2 盖板正反面

真如塔位于嘉兴城南真如寺内，是嘉兴“七塔”中最高的古塔。北宋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，“南法师者募缘兴建，烧造五色琉璃瓦，以为庄严”〔清〕许瑶光重辑：《嘉兴府志·卷十八》，光绪四年鸳鸯书院刊本〕。后几经兴废，至清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僧明句重建。塔为七层转身木檐的楼阁式佛塔，平面呈六边形，塔第一层一面开券门，第二至第七层每面都有拱形券门，每层均叠涩出檐，上有木质围栏，六檐角均挂铃铎。塔刹为生铁浇铸，由铁质的覆盆、仰莲、七重相轮、宝盖、宝珠、宝瓶组成。20世纪70年代，在拆塔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塔藏文物，其中一件便是清代钱世选血摹的元代赵孟頫手书《金刚经》版刻印本。

经书置于一抽拉式朱漆木盒内，盒盖上绘泥金七层真如塔图，内刻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”，盖反面墨书“浙江嘉兴府嘉兴县盐仓坊奉/佛弟子钱世选刺血书写/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/上祈父亲钱武/年六十八岁/本命壬辰官/九月十三日吉时建生/母亲周氏/年六十一岁/本命己亥官/十一月初八日吉时建生/仰赖佛慈悲庇佑/福寿康宁/子孙昌盛/吉祥如意者/己亥岁小春下瀚五日穀旦”（图1）。

盒内有一木质盖板置于经书之上。盖板正面中间阴刻楷体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”，以绿色颜料填充，反面墨书“癸巳岁九月屠成烈识”（图2）。

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书，纸本，由说法图、经文、跋文组成。说法图横50，纵35厘米，图中释迦牟尼结跏趺坐



图5 赵孟頫、中峰明本题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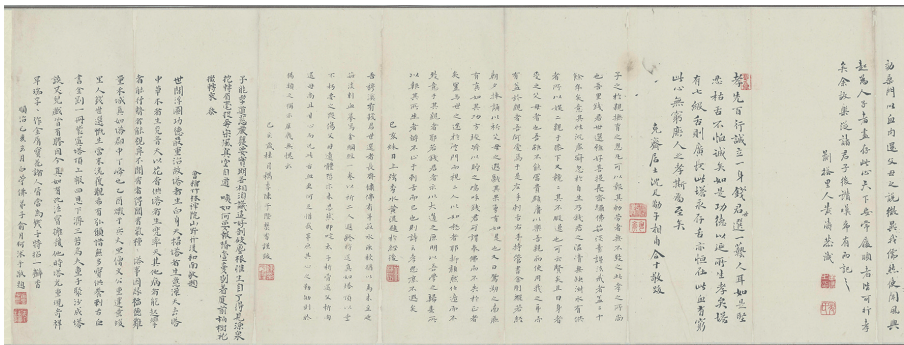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跋文

跨越一个世纪的邂逅：《郑冢古器考》1925—2025年传奇之旅

牛爱红



周立鸟盖方（现定名：莲鹤方壶）壶线描图

“这些文物的线描图精美绝伦。其线条匀细圆转，遒劲有力，仿佛带着一股古老的力量，在诉说着那段被尘封的历史。从这些线条中，我们不仅能感受到前辈们的智慧与才华，更能领略到老馆长那令人钦佩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。当下的我们，正是要传承这样的学术精神啊！”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，轻轻摩挲着硫酸纸上那栩栩如生的莲鹤方壶，不禁感慨万千。此时，钟表已悄然指向了2025年1月3日的刻度。

马萧林手中的书籍，正是那本历经近一个世纪风霜的《郑冢古器图考》，这是一部凝聚了无数智慧与汗水的学术巨著，是20世纪前期著名学者关百益先生（1882—1956）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。故事还得从1925年说起。

1925年（乙丑）闰4月，为母守孝（丁忧）的关百益

心绘制了线描图。历时半年有余，于1925年9月完成了书稿，了却了一桩心愿。

说起此事，要追溯到1923年（癸亥）8月，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，这批文物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沸腾。面对这一重大发现，时任河南通志局金石志纂修的关百益迅速投身到研究工作中去。在近百年春秋战时期的青铜器中，他首先对唯一一件有铭文的“王子婴次炉”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并据此成书《周王子颺器识考》。该书于同年10月由河南金石编篆处印刷出版。然而，关百益先生对其他古物的形制功用未能一一考证辑为专书，心中始终留有遗憾。

《郑冢古器图考》是对新郑出土古器的一次初步整理和研究。书中收录的青铜器造型精美、纹饰繁复，宛如一件件艺术品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些器物不仅是

历史的见证者，更是艺术的瑰宝。全书将出土古器分类编排，详细描述和考订了每件文物的尺寸、重量、造型、纹饰、用途等信息。凡相同之器，皆摹描一图，共录入器物127件（其中铜器113件）。除了对文物进行分件考释，关百益还记录了许多郑公大墓发掘实况，如在墓中发现一“人下颌骨”，“骨面满敷辰砂”，十分特别；又如在中“重器以百余计，而古玉如是寥寥”，仅存玉片等件，复言“传闻当启墓时，得玉盈匣，后不知归于何有”，话语寥寥，但乱世宝器难存之状，已现于纸上。

他还将考古发掘与现代科学互参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。如他通过研究墓中人下颌骨上已生智齿，而牙上珐琅质未曾损坏，推测墓主年逾三十而并未及衰老；又结合在《周王子颺器识考》中所言，推测墓主为郑厉公。书中结论不一定准确，但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，为后来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该书在当时对考古学、历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，推动了相关学科发展。

1930年2月，中华书局将《郑冢古器图考》一书印刷发行，这不仅推动了当时考古学、历史学的发展，也极大地提升了河南博物馆（河南博物院前身）在学术界的影响力。然而，由于时间久远，存量极少，这部著作的庐山真面目始终难以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关百益先生，是一位在史学、金石学、考古学、甲骨学、方志学及书画等多个领域都拥有深厚造诣的杰出学者专家。1930年12月至1935年10月，他担任河南博物馆馆长一职，在考古发掘、学术研究、陈列展览、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，极大地推动了河南博物馆的发展。当时的报刊曾赞誉道：“豫省为历代都会所在地，时常发现古物，故除故宫博物院外，收藏之丰在国内首屈一指者为河南博物馆。”

星移斗转，时光来到百年之后。

（下转8版）